

史学批评怎样促进史学发展^{*}

◎ 瞿林东

内容提要 史学批评是史学活动的一个方面,也是史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。这个驱动力主要表现在:在史学批评的思想基础上推动新的历史著作面世;在史学批评中人们对于概念的积累、深化和运用,促进了史学理论的发展;史学批评对前人的著作还有拾遗补阙、纠正谬误的价值;史学批评又是联系史学成果与社会的桥梁,对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起着积极的引导作用。在当今社会,史学批评应受到广泛重视,史学批评也一定大有可为。

关键词 史学批评 史学理论 史学发展 续作 改作 重作

(中图分类号)K09 (文献标识码)A (文章编号)0447-662X(2016)10-0085-07

DOI:10.15895/j.cnki.rwzz.2016.10.012

从中国古代史学的内省之功、反思之道以及史学发展之连续性的特点来看,在一定的意义上说,一部中国史学发展史可以看作是一部中国史学批评史。在这个发展过程中,由于史学批评的逐渐展开,还不断滋生出一些新的史学概念,而这些概念的提出和运用,久之乃成为史学范畴,进而促进史学理论的发展。史学批评的展开,不仅有益于当世和后世史学发展,同时对以往的史学也有拾遗补阙、阐发新意之功。史学批评还在推动史学成果走向社会、扩大史学成果的社会影响。凡此,都显示出了史学批评在促进史学发展方面所产生的积极影响。本文就上述前两个问题作一简要论述,用以说明史学批评在史学活动中应受到更多的关注。

一、史学批评推动新的史学著作面世

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,因史学批评而引发了新的史学著作的面世,是一个常见的现象,甚至可以视为一个规律性现象。这主要有三种情况:一是批评前史而续作;二是批评前史而改作;三是批评前史而重作。

第一种情况,即续作。班彪、班固父子都对司马迁《史记》有所批评,又都表示以续作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新著。班彪在回顾历代历史著作时对司马迁《史记》评论道:

孝武之世,太史令司马迁采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,删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,据楚、汉列国时事,上自黄帝,下讫获麟,作本纪、世家、列传、书、表,凡百三十篇,而十篇缺焉。迁之所记,从汉元至武以绝,则其功也。至于采经摭传,分散百家之事,甚多疏略,不如其本,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,论议浅而不笃。其论术学,则崇黄老而薄《五经》;序货殖,则轻仁义而羞贫穷;道游侠,则贱守节而贵俗功;此其大蔽伤道,所以遇极刑之咎也。然善述序事理,辩而不华,质而不野,文质相称,盖良史之才也。诚令迁依《五经》之法言,同圣人之是非,意亦庶几矣。^①

这是班彪对司马迁《史记》面貌的概括,从中可以看

^{*} 基金项目: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”(15JJD770004)

^① 范曄《后汉书》卷40上《班彪列传上》,中华书局,1965年,第1325页。



出,班彪对司马迁在文献处理方面和撰述思想方面,都作了负面的评价。但班彪对《史记》叙事的理路和文采都给以肯定,并称赞司马迁是“良史之才”。“良史”之说,出自孔子评价春秋时期晋国史官董狐,^①可以认为是很高的评价了。

班彪熟知历史撰述的历史,又对司马迁《史记》有所褒贬,意欲在此基础上有所撰述,名曰“后篇”,以续司马迁之书。班彪自述其撰述缘由、旨趣和方法,写道:

夫百家之书,犹可法也。若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、《太史公书》,今之所以知古,后之所由观前,圣人之耳目也。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,公侯传国则曰世家,卿士特起则曰列传。又进项羽、陈涉而黜淮南、衡山,细意委曲,条例不经。若迁之著作,采获古今,贯穿经传,至广博也。一人之精,文重思烦,故其书刊落不尽,尚有盈辞,多不齐全。若序司马相如,举郡县,著其字,至萧、曹、陈平之属,及董仲舒并时之人,不记其字,或县而不郡者,盖不暇也。今此后篇,慎核其事,整齐其文,不为世家,唯纪、传而已。传曰“杀史见极,平易正直,《春秋》之义也。”^②

在这段议论中,班彪一方面表明《太史公书》是属于“犹可法”的范围之内,另一方面则从人物传记的升降、文献处理、体例不一等方面进一步指出《史记》存在的问题,进而表明其所撰“后篇”将不复存在此类问题而做到“平易正直”以符合“《春秋》之义”。范晔《后汉书》班彪本传说班彪“作后传数十篇”,班彪自称说是“今此后篇”,都有一个“后”字,可见续作前史无疑。可惜其所撰述不曾流传下来,或有些当为其子班固所著《汉书》吸收。

至于班固著《汉书》,其缘由、旨趣与班彪同,他虽是改《史记》通史为断代,且不以续作自况,但其仍难以割断与前史的关联。《汉书·叙传》中有这样一段话,透露出“续作”的性质。班固写道:

固以为唐虞三代,《诗》《书》所及,世有典籍,故虽尧、舜之盛,必有典谟之篇,然后扬名于后世,冠德于百王,故曰“巍巍乎其有成功,焕乎其有文章也!”汉绍尧运,以建帝业,至于六

世,史臣乃追述功德,私作本纪,编于百王之末,厕于秦、项之列。太初以后,阙而不录,故探纂前记,缀辑所闻,以述《汉书》,起元高祖,终于孝平、王莽之诛,十有二世,二百三十年,综其行事,旁贯《五经》,上下洽通,为春秋考纪、表、志、传,凡百篇。^③

班固一方面批评《史记》把汉朝历史“编于百王之末,厕于秦、项之间”,一方面又说他“探纂前记,缀辑所闻,以述《汉书》”。可见班固同其父班彪一样,也是在批评《史记》的思想基础上,做着“续作”前史的事情,只是《汉书》同“后篇”在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异罢了。值得注意的是,尽管班氏父子对司马迁《史记》各有褒贬,但在正面评价上,班固显得更胜于其父班彪。班固在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后论中这样写道:

故司马迁据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,采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,述《楚汉春秋》,接其后事,讫于天汉。其言秦汉,详矣。至于采经摭传,分散数家之事,甚多疏略,或有抵牾,亦其涉猎者广博,贯穿经传,驰骋古今,上下数千载间,斯以勤矣。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,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,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,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,此其所蔽也。然自刘向、扬雄博极群书,皆称迁有良史之材,服其善序事理,辨而不华,质而不俚,其文直,其事核,不虚美,不隐恶,故谓之实录。^④

这里引用了刘向、扬雄的话,除了“良史之材”的高度评价,又有“故谓之实录”的赞誉。这成了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的经典评价。

在中国史学史上,班固《汉书》与司马迁《史记》齐名,史称“马班”或称“史汉(《史记》《汉书》)”。其间,史学批评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^① 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本,中华书局,1981年,第663页。

^② 范晔《后汉书》卷40上《班彪列传上》,中华书局,1965年,第1326~1327页。

^③ 班固《汉书》卷100下《叙传下》,中华书局,1962年,第4235页。

^④ 班固《汉书》卷62《司马迁传》后论,中华书局,1962年,第2737~2738页。

第二种情况,是批评前史并在前史基础进行改作,而改作后的著作亦成名著。荀悦的《汉纪》、袁枢的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即属于这种情况。

荀悦据班固《汉书》而著《汉纪》,是受命于汉献帝而作。《后汉书·荀淑列传》附《荀悦列传》记:汉献帝时,荀悦“作《申鉴》五篇。其所论辩,通见政体,既成而奏之……帝览而善之。”又,“帝好典籍,帝以班固《汉书》文繁难省,乃命悦依《左氏传》体以为《汉纪》三十篇,诏尚书给笔札。辞约事详,论辩多美。”^①荀悦有才学,“尤好著述”,故改作之书,亦能成为名著。荀悦在《汉纪·序》中写道:

建安元年。上巡有幸许昌,以镇万国。外命亢辅,征讨不庭;内齐七政,允亮圣业;综练典籍,兼览传记。其三年,诏给事中秘书监荀悦抄撰《汉书》,略举其要。假以不直,尚书给纸笔,虎贲给书吏。悦于是约集旧书,撮序表志,总为帝纪,通比其事,例系年月。其祖宗功勋,先帝事业,国家纲纪,天地灾异,功臣名贤,奇策善言,殊德异行,法式之典,凡在《汉书》者,本末体殊,大略粗举。其经传所遗阙者差少,而求志势有所不能尽繁重之语。凡所行之事,出入省要,删略其文,凡为三十卷,数十余万言,作为帝纪,省约易习,无妨本书。有便于用其旨云尔。会悦迁为侍中。其五年书成。^②

举凡改作的缘由、方法、重要内容等,均一一有所交待,而特别强调“凡在《汉书》者,本末体殊,大略举要”,“省约易习,无妨本书”,表明《汉纪》与《汉书》的关系。这是由于史学批评而促成对前史改作的突出一例。

正是由于这一改作而引发的历史撰述,使荀悦在史学上的才识得以充分显示出来。荀悦在《汉纪·序》中继续写道:

凡《汉纪》:有法式焉,有鉴戒焉,有废乱焉,有持平焉,有兵略焉,有政化焉,有休祥焉,有灾异焉,有华夏之事焉,有四夷之事焉,有常道焉,有权变焉,有策谋焉,有诡说焉,有术艺焉,有文章焉。斯皆明主贤臣命世立业,群后之盛勋,髦俊之遗事。是故质之事实而不诬,通之万方而不泥。可以兴。可以治,可以动,可以

静,可以言,可以行,惩恶而劝善,奖成而惧败,兹亦有国之常训,典籍之渊林。虽云撰之者陋浅,而本末存焉尔。故君子可观之矣。^③

这一连串的十几个“有”字和几个“可以”,反映了荀悦对于历史、社会、史学功用的认识和理解,显示出一个史学家的深刻见识,这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亦不多见。荀悦还在《汉纪》开篇提出撰述史书之总的宗旨,认为“立典有五志焉:一曰达道义,二曰彰法式,三曰通古今,四曰著功勋,五曰表贤能。于是天人之际,事物之宜,粲然显著,罔不备焉。”^④荀悦的这一著述思想,后被唐代史家刘知幾所引用、发挥,进一步扩大了其积极影响。史载,唐太宗曾赐凉州都督李大亮荀悦《汉纪》一部,并下书写道“卿立志方直,竭节至公,处职当官,每副所委,方大任使,以申重寄。公事之闲,宜寻典籍。然此书叙致既明,议论深博,极为治之体,尽君臣之义,今以赐卿,宜加寻阅也。”^⑤唐太宗以“叙致既明”等四句话概括了《汉纪》的要义,亦可见其对后世的影响之大。

至于袁枢著《通鉴纪事本末》也是因感《资治通鉴》“苦其浩博”而改作,并由编年体史书而创制为纪事本末体史书,成为中国史学史上一一种新的史书体裁确立的里程碑。《宋史·袁枢传》记,袁枢在南宋孝宗乾道年间(1165-1173)先后任温州判官、太学录、严州教授,其间“枢常喜诵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,苦其浩博,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,号《通鉴纪事本末》。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其书,奏于上,孝宗读而嘉叹,以赐东宫及分赐江上诸帅,且令熟读,曰‘治道尽在是矣。’”^⑥由此可知,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在面世当时就产生了很大影响,引起社会上层的关注。宋孝宗说的“治道尽在是矣”,道出了此书在经世致用方面的特点。与袁枢“志同志,行同行,言同言”

^① 范曄《后汉书》卷62《荀淑列传》附《荀悦传》,中华书局,1965年,第2062页。

^{②③} 荀悦《汉纪》,《两汉纪》本,中华书局,2002年,书首第1~2页。

^④ 荀悦《汉纪》卷1,《两汉纪》本,中华书局,2002年,正文第1页。

^⑤ 刘昉等《旧唐书》卷62《李大亮传》,中华书局,1975年,第2388页。

^⑥ 脱脱等《宋史》卷389《袁枢传》,中华书局,1977年,第11934页。



的挚友杨万里在《通鉴纪事本末叙》中,比较了《资治通鉴》与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在体裁体例上的不同,他写道:

子(按:指袁枢)因出书一编,盖《通鉴》之本末也。予读之,大抵叙事之成以后于其萌,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,其情匿而泄,其故悉而约,其作窅而糲,其究遐而迩,其于治乱存亡,盖病之源医之方也。予每读《通鉴》之书,见事之肇于斯,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。盖事以年隔,年以事析,遭其初莫绎其终,揽其终莫志其初,如山之峨,如海之茫,盖编年系日,其体然也。今读子袁子此书,如生乎其时,亲见乎其事,使人喜,使人悲,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。^①

杨万里极动感情地称赞《通鉴纪事本末》之易读与感人,但他又十分理性地看待阅读《资治通鉴》时的困惑,认为这是“编年系日,其体然也”,甚至还说袁枢所著“此书也,其入《通鉴》之户欤”,显示出大家心态。清代史家章学诚在论及这两部书时写道:“司马《通鉴》病纪传之分,而合之以编年。袁枢《纪事本末》又病《通鉴》之合,而分之以事类。按本末之为体也,因事命篇,不为常格,非深知古今大体,天下经纶,不能网罗隐括,无遗无滥。文省于纪传,事豁于编年,决断去取,体固用神,斯真《尚书》之遗也。”^②章学诚对袁枢评价不高,但这几句话说得还算得体。在《通鉴纪事本末》问世后,仿效者蜂起,历朝纪事本末先后产生出来,间接地反映出袁枢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。

第三种情况,即重作。这是针对因批评前史而不得不重作的史学现象而言。限于篇幅,这里只举一个突出事例略作说明,即盛唐史家李延寿遵其父李大师遗命,撰《南史》《北史》事。

李大师是隋唐之际人,对南北分裂与隋唐统一这两种不同的政治局面有深刻的认识,并在历史撰述上有所抱负。李延寿是这样回忆和介绍他父亲李大师的:

大师少有著述之志,常以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魏、齐、周、隋南北分隔,南书谓北为“索虏”,北书指南为“岛夷”。又各以其本国周悉,书别国并不能备,亦往往失实。常欲改正,将拟《吴越春

秋》编年以备南北。^③

据此可知,李大师要在两个方面“改正”旧史:一是南北各史诬称对方,或“岛夷”、或“索虏”;二是南北各史多有曲笔。其志向是“编年以备南北”,即以编年体记述南北朝史事,并改正上述两个弊端。从当时情况来看,李大师所能读到的南北朝正史,只有沈约的《宋书》、萧子显的《南齐书》和魏收的《魏书》,或许还有魏澹的《魏书》,其余各朝正史尚在撰述之中,故其所知有的或来自传闻。但就上述诸史,是可以证明李大师所言不谬。然而,李大师并未实现自己的志向,他在着手撰述后不久就去世了。

李延寿决心实现父亲愿望,“既家有旧本,思欲追终先志”而他因先后在史馆参与修撰梁、陈、齐、周、隋“五代史”以及《晋书》和《隋书》十志(即《五代史志》)等事宜,得以抄录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魏、齐、周、隋八部正史,在此基础上,重作南北朝史,他的撰述方法及其成果是:

本纪依司马迁体,以次连缀之。又从此八代正史外,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,皆以编入。其烦冗者,即削去之。始末修撰,凡十六载。始宋,凡八代,为《北史》、《南史》二书,合一百八十卷。其《南史》先写讫,以呈监国史、国子祭酒令狐德棻,始末蒙读了,乖失者亦为改正,许令闻奏。次以《北史》咨知,亦为详正。因遍咨宰相,乃上表。^④

李延寿在上表中具体说明了《南史》《北史》的起讫年代、相关卷帙以及对前史处置与新增资料的情况:“起魏登国元年,尽隋义宁二年,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,兼自东魏天平元年,尽齐隆化二年,又四十四年行事,总编为本纪十二卷、列传八十八卷,谓之《北史》;又起宋永初元年,尽陈祯明三年,四代一百七十年,为本纪十卷、列传七十卷,谓之《南史》。凡八代,合为二书,一百八十卷,以拟司马迁《史记》。……唯鸠聚遣逸,以广异闻,编次别代,共为

① 袁枢《通鉴纪事本末》书首,中华书局,1964年,第1页。

② 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,叶瑛校注本,中华书局,1994年,第51~52页。

③④ 李延寿《北史》卷100《序传》,中华书局,1974年,第3343、3344页。

部秩。除其冗长，摭其菁华。若文之所安，则因而不改，不敢苟以下愚，自申管见。虽则疏野，远惭先哲，于披求所得，窃谓详尽。”^①《南史》《北史》不同于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魏、齐、周、隋八代正史之处是：第一，以通史体例贯穿宋、齐、梁、陈四史为《南史》，魏、齐、周、隋四史为《北史》；第二，“除其冗长，摭其菁华”改正“往往失实”之处；第三，以互见法沟通《南史》《北史》的内在联系，凡重大史事涉及对方者则于相关处注明“语见《北史》”或“语见《南史》”；第四，这是最重要的不同处，即除去《宋书》《南齐书》《魏书》互相贬称之语，反映出南北一统、天下一家的历史观念，这是所谓“重作”最重要的标准。《南史》《北史》重著南北朝史的努力表明：即使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来说，史学家也要采用适当的形式，把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表现出来，这是中国史学上最重要的启示之一。《南史》《北史》受到后世史家欧阳修、司马光等的高度评价。^②

以上三种情况足以表明，史学批评对于推动新的史学著作面世，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。

二、史学批评促进史学理论的发展

史学批评是人们的精神活动的一部分，它的关注点是古往今来的历史著作及其所反映出来的历史进程、历史面貌、历史经验与史学家的活动等等。而在史学批评过程中，批评者为了明确地表达对批评对象如史家的思想和行为，史书的优劣高下与特点，以至于其他相关的史学现象，就必然要在遣词造句、概念运用上持谨慎态度，以求得评论的简洁和准确。而这种用语和概念得到时人和后人认同并继续使用，则会形成史学上的术语或范畴，进而成为史学理论的一部分。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，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，这里举古老的“事、文、义”之说为例，探究其道理。

孟子在讲到孔子作《春秋》的历史环境及《春秋》的内容时说：

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，诗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晋之《乘》、楚之《檮杌》、鲁之《春秋》，一也；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。孔子曰：“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”^③

这里说的事、文、义，可以理解为史事、表述、思想，成为后世史学批评常常提及的概念。尽管人们在具体的解说上并不十分契合，各种说法也并不十分一致，但大的方向和发展趋势则是相近的。

这里，我们首先想到的，是班固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后论中对司马迁《史记》的评论，其中有几句话是“然自刘向、扬雄博极群书，皆称迁有良史之才，服其善叙事理，辨而不华，质而不俚，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故谓之实录。”^④所谓“其文直，其事核”与孟子说的“事、文、义”中的事与文，自有一定的关联。班固同他父亲一样，在一些价值判断上跟司马迁有所歧异，评价中没有直接说到“义”，是极自然的。应当强调的是，“事、文、义”从史事、文字表述、思想判断三个方面评价《春秋》，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对史书进行全面评论的重要事例，而班固便是最早的响应者之一。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，班固引用他人之语连同自身的用语对司马迁《史记》所作的评论，成为后世史学批评中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观点和用语，以至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，这是班固本人所没有想到的。

“事、文、义”中的“义”，本是“宜”的意思，《礼记·中庸》说“义者宜也”。^⑤这也可解释为符合一定标准的人的行为，故孟子认为“义，人之正路也。”^⑥司马迁著《史记》，很注重从“义”的眼光去判断历史人物的行为，例如：他写《春申君列传》是出于对“黄歇之义”的赞赏“以身殉君，遂脱强秦，使驰说之士南向走楚者，黄歇之义，作《春申君列传》”。他作《游侠列传》是感叹于那些“救人于厄，振人不赡，仁者有乎；不既信，不倍言，义者有取焉。

^① 李延寿《北史》卷100《序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3344～3345页。

^② 瞿林东《〈南史〉和〈北史〉》第五章“《南史》《北史》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”，人民出版社，1987年。

^③ 《孟子·离娄下》杨伯峻译注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，第192页。

^④ 班固《汉书》卷62《司马迁传》后论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，第2738页。

^⑤ 《礼记·中庸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1629页。

^⑥ 《孟子·离娄上》杨伯峻译注本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，第172页。



作《游侠列传》。”“黄歇之义”是讲的上层人物,游侠之义是写的下层人物,都是以“义”来判断他们的行为。其实司马迁作《史记》七十列传有一个总的标准,即“扶义倜傥,不令己失时,立功名于天下,作七十列传。”^①尽管司马迁对“义”的运用并非着眼于史学批评的考虑,但其有两个方面的意义:一是表明司马迁在评价、判断历史人物时重视“义”的立场;二是有益于人们对“事、文、义”中“义”的理解。后世史家在史学评价中,便从大处着眼使用“义”的概念。

范晔在评论司马迁父子、班固父子时写道:

论曰:司马迁、班固父子,其言史官载籍之作,大义粲然著矣。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。迁文直而事核,固文赡而事详。若固之序事,不激诡,不抑抗,赡而不秽,详而有体,使读之者矍矍而不馱,信哉其能成名也。彪、固讥迁,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。然其论议常排死节,否正直,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,则轻仁义,贱守节愈矣。^②

这是就《史记》《汉书》整体面貌而言,故称“大义”;“粲然”,谓鲜明之意,表示对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认可和赞叹。评论中肯定司马迁、班固“二子有良史之才”,并对二者之文的特点有精到点评,同时对班彪、班固批评司马迁处提出批评,再次使用了“义”,认为班氏父子不看重义。今天看来,这是涉及史学家的价值观方面的问题了。范晔的这一段评论,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影响深远,尤其是关于“马班异同”或“马班比较”方面,可谓经典之评。范晔以《汉书》为参照,对他撰写《后汉书》有一定的积极影响,这在《后汉书》史论的撰述上尤为突出。

南宋史家郑樵著《通志》巨作,其总序对“义”的运用又有新的发挥。《通志·总序》开篇指出:

百川异趣,必会于海,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。万国殊途,必通诸夏,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。会通之义大矣哉!自书契以来,立言者虽多,惟仲尼以天纵之圣,故总诗、书、乐而会于一手,然后能同天下之文,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,然后能极古今之变。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,百世之下能及。^③

郑樵以形象的比喻来说明“会通之义”在史学上的重要,文中对孔子整理文献之功虽有过分夸张之嫌,但其意可以理解。这是中国史学上第一次把“会通”与“义”联系起来,其气象跟范晔所论《史记》《汉书》“大义粲然著矣”颇相近。当然,郑樵是不会赞同范晔对《汉书》作这样评价的;不仅如此,他对《汉书》一再予以贬斥。郑樵认为“自《春秋》之后,惟《史记》擅制作之规模。不幸班固非其人,遂失会通之旨。司马氏之门户,自此衰矣。”又借孔子的话批评班固说“孔子曰‘殷因于夏礼,所损益可知也;周因于殷礼,所损益可知也。’此言相因也。自班固以断代为史,无复相因之义。虽有仲尼之圣,亦莫知其损益。会通之道,自此失矣。”^④从史学批评的观点来看待郑樵关于“会通之义”“会通之旨”“会通之道”的表述,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两点认识:第一,郑樵把“会通”与“义”联系起来,意在创造宏大的史学规模,尤其是他对“会通”用了三个不同的概念而再三致意,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气度与信心,而他的《通志》尤其是其中的《二十略》的面世,足以证明他的这种气度与信心。这是继司马迁之后对中国古代通史理论的又一次深刻的阐发,凸显出郑樵在中国史学批评史和史学理论上的重要贡献。第二,郑樵对班固的贬斥,大多不能成立,其中道理,郑樵未必不自知,但出于对“会通”的追求和执着,难免有门户之嫌,这又显得他的气量的狭小。

从以上司马迁、范晔、郑樵对于“义”的运用,可见“事、文、义”之“义”在史学批评中重要性。

此外,从“事、文、义”是概括史书整体面貌这一点看,宋人吴缜提出的事实、褒贬、文采三个概念,是在史学批评中继承和发展了前者,具有更突出的理论意义。吴缜在其所著《新唐书纠谬》一书的序文中指出:

夫为史之要有三,一曰事实,二曰褒贬,三曰文采。有是事而如是书,斯谓事实;因事实而

^① 司马迁《史记》卷130《太史公自序》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3314、3318、3319页。

^② 范晔《后汉书》卷40下《班彪列传下》后论,中华书局,1965年,第1386页。

^{③④} 郑樵《通志·总序》,《通志二十略》本,中华书局,1995年,第1~3页。



寓惩劝,斯谓褒贬;事实、褒贬既得矣,必资文采以行之,夫然后成史。至于事得其实矣,而褒贬、文采则阙焉,虽未能成书,犹不失为史之意。若乃事实未明,而徒以褒贬、文采为事,则是既不成书,而又失为史之意矣。^①

吴缜并未说明他是源于“事、文、义”而引发出来这一理论的,那么为什么“事、文、义”同事实、褒贬、文采(只需把褒贬、文采互换位置)竟如此契合呢?道理很显然,因为这二者都是着眼于史书全貌提出问题,史书自身内在的联系,使它们在一千多年的时间跨度中“走到一起”。当然,吴缜所论比之于“事、文、义”论点更明确,层次更清晰,重点更突出,因而更具有理论上的普遍意义。^②

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,有关作史宗旨、史学功用、史书撰写、史家修养等一些重要理论问题,大多是在史学批评中酝酿和提出的;许多术语、概念、范畴也大都是在这个过程酝酿和形成的,如良史、信史、直书、曲笔、会通、断代、叙事、史论、论史、史法、史意、史才、史学、史识、史德、体裁、体例、书法、事实、褒贬、文采等等。从史学自身的意义上说,甚至可以认为,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造就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。刘知幾的《史通》和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是两个不同时期在这方面的代表作,前者以批评为主而兼具理论意义,后者以理论为主而不乏批评的内容。这方面不乏论者,故本文不多涉及。

史学批评促进史学发展,还表现在另外两个方面:一个方面是,史学批评的成果对前史有拾遗补阙、纠正谬误的作用,而这两种作用是互相交叉的。这类史学批评以不同的撰述形式表现出来,或者说包含在种种不同形式的著作之中,有的以注的形式出现,如裴松之的《三国志注》;有的直接以“纠谬”“纂误”的专书出现,如吴缜的《新唐书纠谬》《五代史纂误》;有的以笔记的形式出现,如叶适的《习学记言序目》、洪迈的《容斋随笔》;有的以书录解题的形式出现,如晁公武的《郡斋读书志》、陈振孙的《直斋书录解题》,清代四库馆臣的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是这方面的代表作;有的以典制史的形式出现,如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;有的以考证著作的形式出现,如钱大昕的《廿二史考异》、赵翼

的《廿二史札记》、王鸣盛的《十七史商榷》等。以上种种著述,数量庞大,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丰富资源。

史学批评还有一个重要作用,是沟通史学成果与社会各阶层人群的联系,扩大史学的社会影响,进而促进史学发挥应有的社会功用。在古代,讲学是发挥这种作用的形式之一。从《朱子语类》中,我们可以读到朱熹对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通典》等重要史书的评论,也可以读到他对《资治通鉴》《稽古录》《唐鉴》《唐史论断》等本朝史家著作的评论。他还教导学生“读史当观大伦理、大机会、大治乱得失”,^③这些在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。它如隋唐时期“《汉书》学”的兴盛,跟私人讲学有直接联系。此外,家学也是传播史学影响的一种形式,宋人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中记载了他向晚辈解说“历代史”的情形。近代以来,借助于报刊、出版事业,史学批评迅速发展,其影响力更加广泛,梁启超的一篇《新史学》的文章,几乎搅动了整个历史学界。而当今的网络时代,给史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和平台,史学批评的主体有更多的机会发表真诚的、有真知灼见的论著,推动史学和史学理论的发展,并在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中,表达出中国学者的话语和风格。

史学发展说到底还是受着时代的推动和先前遗产的启示,其间也同相近知识领域的互动有关,但史学批评作为它的一个内在的驱动力所产生的作用,也是一个重要的积极因素,其可贵处就在于它的自省精神和创新精神。

作者单位: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

责任编辑:黄晓军

^① 吴缜《新唐书纠谬·序》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,中华书局,1985年,第1页。

^② 瞿林东《事实·褒贬·文采:吴缜作史三原则说的理论意义》,《安徽师范大学学报》2014年第1期。

^③ 《朱子语类》卷11,《中华书局》,1986年,第196页。

